

Thoughts on the Social Form and Individuals' Flowing: Margaret Atwood's *The Testaments*

WU Liju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ly 18, 2021

Accepted: November 6, 2021

Published: January 31,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WU Lijuan. (2021). Thoughts on the Social Form and Individuals' Flowing: Margaret Atwood's *The Testament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4), 045-05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1.0104.007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1.0104.007>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anadian writer Margaret Atwood's new work *The Testaments* is full of concern for human nature, society and human living conditions. To some extent, the novel functions as a kind of medium that Atwood thinks can purify human nature and reveal the truth. The novel devotes itself to exploring a new social regime, an external form and an internal ideological found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riginal Gilead. Furthermore, the novel intends to reflect the essence of individuals' freedom and explain the different ways of individuals' evolution and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Agnes and Nicole so as to realize the social redemption formed b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In this sense, the novel reflects the will of human beings to pursue a universal social community and strengthens the individuals' subjectivity in the community from the aspect of the public dimension.

Key Words: *The Testaments*; social form; individual; love; communit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WU Lijuan is a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ivywj0325@163.com.

社會形式與個體的流變之思 ——評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證詞》

吳麗娟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要:當代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其新作《證詞》中飽含了對人性、社會和人類生存狀況的關懷，讓文學發揮滌蕩人性和昭示真理的作用。小說在原有的基列國背景下，以對一種新的社會政權的探尋為導向，同時思

考社會得以構建和運行的外在形式與內在思想根基,並且通過對艾格尼絲和尼科爾兩位主人公的細緻刻畫,進一步反思個人自由的實質,詮釋了個體流變或是個體意識逐漸趨向成熟的不同方式,從而實現了由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所形成的社會救贖維度。這既反映了人類追求普遍聯繫的社會共同體意願,也在公共維度上夯實了共同體中的個人主體性。

關鍵詞:《證詞》;社會形式;個體;愛;共同體

引言

2019年9月,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1939-)的新作《證詞》^①(*The Testaments*)擺滿了倫敦水石書店(Waterstone's)的書架,幾乎無人能夠躲避書店玻璃窗內一片醒目的翠綠。同年10月,《證詞》與英國作家伯納德·埃瓦裏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 1959-)的作品《女孩、女人和其他人》(*Girl, Woman, Other*)共同摘取了2019年的布克獎。對於時年79歲的阿特伍德來說,無疑是自《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獲獎之後的又一個驚喜。《證詞》的故事設定在《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以下簡稱《使女》)15年之後,回到讀者熟知的基列。小說採取三條敘事線(尼科爾的自敘、艾格尼絲的自敘、莉迪亞嬈嬈的自敘)並行的方式在過去與當下之間遊走。而隨著小說情節的不斷深入,種種謊言與假像也不期而遇,這使得小說中的人物開始反思曾經盛極一時的基列政權如今是否已經日益空洞、腐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在第一部《使女》中備受關注的女主奧芙弗雷德的行蹤依舊是個謎團,作者並未在《證詞》中有明確的交代,但讀者自會會心地意識到自2195年之後^②,基列國發生的每一件事背後都飄蕩著她的影子。在《證詞》中奧芙弗雷德實實在在地構成了小說另外兩位敘述者,也就是她的女兒們艾格尼絲和尼科爾的敘述背景,同時也是基列政府政治核心的墊腳石。

自《證詞》問世之後,外界對它一直有頗多爭議,儘管已經有《使女》這部一路叫好的前傳作為鋪墊。很多評論者認為:“《證詞》達不到前一部作品帶來的影響力和效果”^③,以及小說在“發聲視角和場景的設定這兩個重要的方面刻畫的不到位”^④。如果從小說被期待發展的主要脈絡出發,甚至可以認為:“小說後半部分儼然偏離為一部公路旅行的友情電影,穩重虔誠的艾格尼絲和莽撞率性的尼科爾飾演一對看起來不那麼般配的小夥伴”^⑤。其實,如果能夠避免將阿特伍德一貫建構的基列世界完全錨定在一個框架之內,並且深入探究她社會批判意識下對意義和價值的追尋,那麼便不難發現阿特伍德創作《證詞》的初衷與願景並沒有發生赫然斷裂。作為一個國際文化屆名人,阿特伍德可以說在其多部作品中都力圖探尋社會能夠良好運行的外在形式和內在思想根基,並且深入思考在不斷變奏的社會形式下,個體該以何種方式、何種價值觀立身處世。循此前提,本文將探究阿特伍德在《證詞》中對一種可能性的社會形式的思考,並考察作者如何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演繹個體的蛻變與成長過程,展開對人類社會紐帶的思考,尋求人們在個體型構中對新一輪社會共同體的希冀。

一、社會形式的變奏與民主的可能性想像

在阿特伍德的論著《生存:加拿大文學主題指南》(*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中,阿特伍德曾經做過一個弗萊式的提問:“這裏是哪里?”,阿特伍德認為這個問題指向的是“一個人在發現自己處於陌生的領域時發出的疑問。而且它還包含著另外一些問題:這個地方處在什麼位置?我怎樣熟悉它?”^⑥。阿特伍德的回答其實涵蓋了兩層意義,一則是對社會形式的探尋;二則是對社會形式之下個體的建

構。有學者認為，在阿特伍德 50 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她一直在多元的社會文化語境下思考國家（加拿大）“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和民族構成”^⑦，並由此切入到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深思。這一思想在新作《證詞》中得到延續，作家在解構基列政權的同時其實一直在反思該如何建構一個新的、適宜的社會制度，從而療愈舊政權帶來的傷痛。從《證詞》中的種種指向來看，一個可能性的猜測是，阿特伍德或許在影射以一種“民主”^⑧的社會形式來置換集權的基列政權。例如小說中尼科爾剛出場時，就介紹她在加拿大的學校是一所聲稱“為了更好地瞭解民主自由與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的學校”（*The Testaments* 49），她雖然不是很喜歡她的學校，但是她卻相信“這所學校可以引領她找到一種真正的生活”（*The Testaments* 49）。隨後，作者通過尼科爾的視角展開了一場遊行示威活動，遊行的橫幅上寫著這樣的口號：“關閉邊界！基列管好你們的蕩婦和小子，我們受夠了！停止入侵！”（*The Testaments* 51）。隨著遊行情緒的高漲，媒體很快將這一事件推至風口浪尖，一名曾經逃出基列的女性，如今作為難民營的代表講述了那些剛出生的孩子是如何被殘忍的帶離她們身邊，且如果她們試圖尋回自己的孩子，將被視為是對上帝的一種不尊重。表面看來，這一遊行意在揭露奉行極權統治的基列對世道人心的吞噬，實質是表徵了長期處於壓制狀態下的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人們逐漸認識到某一種現象是極度不公正的。那麼便湧現出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在以往基列統治下的生活中，正義實際上從未被人們直接經歷過，相反，我們所經歷的都是不公正，正因為如此，才幫助我們形成了關於正義的觀念。依據艾利斯·揚的觀點，“民主既是社會正義的構成要素，也是實現正義的條件，人們之所以致力於發展民主，就是因為堅信民主是能夠對抗不正義並實現正義的最佳政治手段”^⑨。小說中，阿特伍德之所以刻畫這場場面激烈的抗爭，也是在暗示圍繞著正義至上、平等至上的民主與基列之間的拉鋸正在展開，人們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因為具備了這些屬性，從而開啟了訴諸正義的過程。

但是，僅在基列的外部層面宣揚一種形式上的蛻變遠遠不夠，還需要找到基列內部層層腐爛的證據，才能進一步證明當下政權更迭、社會轉型的必要性。小說將這道證明題交由艾格尼絲來完成，將艾格尼絲平凡而又無能無力的善良作為一面鏡子，折射基列浮華的權威之下的悲哀。首先是艾格尼絲家中的使女奧芙卡爾生產一事。生產當天，艾格尼絲家中聚集了很多上流社會的太太們，她們穿著統一化的藍色披風來到了大主教卡爾的家中，艾格尼絲形容她當時的心情：“我並不知道那一刻具體什麼時候來的，但是我聽到她們侃侃而談中夾雜著肆意的笑聲”（*The Testaments* 100）。與痛苦的生產相對照，太太們此時的聚會顯得既冷漠又不合時宜。作者藉由兩種氛圍之間的反差，又一次提請讀者回憶起這種等級化遊戲規則下使女的符號化存在效用：生產任務完成！使女失去效用！後來，艾格尼絲憑藉自己的勇氣以及同伴的幫助，進入到基列最為核心的閱讀室。在那裏，艾格尼絲揭露了很多曾經被掩蓋的事實。例如，繼母竇拉實際上才是殺死大主教桑德斯的真正兇手，竇拉作案之後，將一切罪行嫁禍給家中的使女，使女成了替死鬼，而竇拉依舊安然無恙；大主教賈德的妻子們其實都是被他害死的，第一任妻子是被殘忍的推下樓梯摔死的；有兩任妻子是在生產過程中死亡的，但對外卻宣稱是因為敗血病，或者受到某種驚嚇而死；第四任妻子其實是聽從了大主教賈德的命令，將花畫作為興趣愛好，結果出現鎊中毒，對外依舊是編造了胃癌致死的謊言。阿特伍德借助艾格尼絲的機緣使這些真相昭然若揭，並且進一步說明基列的主要缺陷就在於權力帶來的結構性不平等，如果繼續施行基列現存的集權統治，則會強化這些結構性的不平等，這樣社會中擁有較少權力的那一方聲音會一直處於邊緣化，如同惡性循環，永無盡頭。

如此，通過小說中尼科爾與艾格尼絲兩位主人公一正一反的情節演進，阿特伍德揭露出基列此刻的真實現狀：昔日的政權已經江河日下，如今的基列形同一個漂浮在海上的船骸巨怪，其凌駕於社會整體之上的力量體現的只是“統治階級範圍內的表像共同體”^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莉迪亞嬋嬋最終意識到自己一直以來為之服務的基列政府實為空洞，在過去漫長的歲月中，自己與同僚以基列為中心建立的共同體瞬間土崩瓦解。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在小說一開始莉迪亞嬋嬋就陷入極度地後悔與懊惱之中：“如果我能夠像別人一



樣,早點收拾行裝,離開這個國家就好了”(*The Testaments* 66)。阿特伍德曾說:“讓莉迪亞嬷嬷為自己說話,並為自己做決定”^①。從某種角度來說,小說中莉迪亞嬷嬷被賦予更高一層的敘述權威,由她展開敘述的部分不僅是一個客觀、公正、理性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社會轉型的過程。她曾一度表現出對社會變革和孕育新規則的興趣,她認為這場變革不應該從僵硬的教條中尋找答案,而應該從變化著的現實中發現問題。因此要想成功實現社會轉型必須首先以人民的心理體驗與生活體驗為重,這其中包括對社會中民眾的教育、心理和情感每個步驟,以及影響個體民運的外界因素。這樣的思想首先落實到基列的女性身上,通過對女性聲音的傳達實現社會秩序的重新洗牌。在大主教賈德處心積慮地讓莉迪亞嬷嬷踐行社會的兩分領域(*separate spheres*)的過程中,莉迪亞嬷嬷並沒有掩飾自己的價值立場,並竭力為此展開辯護:“女性已經被告知很久了,她們可以在職場以及公共領域實現平等”(*The Testaments* 175);“如果一定要成立一個單獨的女性領域,那就必須徹底的分開。除非有特殊的情況,否則女性在其領域必須擁有主導權,男性不能越過我們設置的門檻”(*The Testaments* 176)。可以看出,莉迪亞嬷嬷對基列目前所採取的穩固政權的措施早已心知肚明,其實質不過是主導階級為繼續推行集權統治而對平民再次施加的一體化編碼。為了應對這種策略,她試圖以循序漸進的路徑來回避大主教賈德所堅持的統治方式,從而實現一種平等、民主、正義的社會形式變奏。

在《證詞》的扉頁中寫著這樣一段話:“你手中握有一把危險的武器,上面承載著來自基列的三個女人的秘密。她們正為你,為我們所有人冒著生命危險”(*The Testaments* 扉頁)。由此我們或許可以更加肯定,不論是從小說中哪一條敘事線開始說起,都能推斷出尼科爾、艾格尼絲以及莉迪亞嬷嬷三人在傳遞一種渴望改變、渴望從現有的秩序中擺脫的信號。她們希望能夠以一種平等、自由以及互通的方式共同介入社會的構序,而在實現這一理想的過程中,民主不僅是最終目的,也是根本手段,其昭示的容納性與可靠性令人嚮往。

二、自由的重構與個體的流變

當基列一旦讓公民有可能從利用性、集權制的結構主義體系中擺脫出來之時,個體性便成為亟待推崇的一個對象,特別是在標舉自由、平等的社會中,個體性是意識形態的主導形式。正是作為“個體”,我們才被帶離集體性行為而走向“個人解決”,才被引導著為了我們自己珍貴的、不可替代的自我而去尋求意義。因此,《使女》中,原本作為“人類良方”,“讓一切回歸自然”^②的制度體系,現在則轉化為《證詞》中保護個體自由與權益的話語體系,集體利益的優先地位被解構了。評論家們之所以認為《證詞》的寫作模式甚至可以說是創作動機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最重要的證據就在於這一問題意識的轉變:小說中的人物實現了以個體為主的自由主義轉向,並且在此基礎上重新理解了個體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般來說,個體的形成不完全是天賦因素所決定,與各自在城邦中所接受的訓練與社會化的過程密不可分。通過這種訓練與社會化過程,個體在城邦中擁有了身份,也習得了其中的社會規範與社會慣例。如果按照亞裏士多德的觀點,城邦是個人生活的完整空間,那麼個人按照習俗和傳統在所處社會中的位置就休戚相關,也就是說,個體在某種程度上踐行著一種“身份”所要求的生活^③。然而,亞裏士多德傳遞的這種個體的“穩固性”在基列那裡卻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影響著個人。艾格尼絲便是典型的例證,所幸的是,她的人生軌跡並非如此,而是經歷了一個逐漸“自主性”的流變過程。在小說開篇,艾格尼絲呈現的是一個典型的溫順女孩形象,這一點從她的名字便可窺見一二,艾格尼絲的英文 *Agnes* 是“羊的意思”(*The Testaments* 19),而羊素有“馴順”之意,統治者冀望於人性如羊,便於管理。她所在的基列國學校有著一套嚴格的規章制度,比如說:“春天和夏天穿粉色,秋天和冬天穿紫紅色,特殊的日子穿白色:像是每個星期天和一些紀念日”,孩子們“不能露出手臂,不能露出頭髮,五歲之前裙子的長度要過膝,五歲之後的長度要到腳踝之上的兩英尺”(*The Testaments* 9)。不難看出,最初的艾格尼絲如同一個“物化的自我”,她的生活來自於基列政府給予她的“名

分”，這也意味著個體一旦受到權力的支配，就喪失了自治和自由，處於被奴役狀態。因此在她身上，最為核心的衝突是對個體施加的各種社會限制與純真的天性所流露出的自由和理想之間的鬥爭，對此她感到十分的困惑和矛盾。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她去牙醫診所就醫的橋段，依照規矩，她需要在家中監護人的陪同下才能出門，但是艾格尼絲心中十分渴望這一難得的獨處時間：“實際上，要是能夠獨自去牙醫診所會讓我感覺到自己的獨立”（*The Testaments* 95），這是她想要適應，或者說想要在生活中擁有一個“占位”的信號，這種以個體權利為導向的“占位”在洛克看來就是“人身”（person）的一種自然延展^⑩。從人物意識蛻變的歷時層面來看，敘述者並沒有完全展示她的每一處細節，而是截取了她人生中幾個重要的時刻，以一種漸變的形式讓讀者感覺出艾格尼絲內心的變化，與大主教賈德的婚姻就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個轉捩點。從婚姻本身來看，它既是一個具體的倫理制度，也同時象徵著一個權力秩序的穩定性和再生產能力。但是，站在艾格尼絲個人的角度來看，這必定是她個體性發展的又一個障礙。於是，她開始計畫著怎樣才能逃離：“我想過要離家出走，但是我要怎麼樣做才可以呢？我又能逃去哪里呢？我對方向感這種東西一無所知：我並沒有在學校學過”（*The Testaments* 224）。這段心路歷程纖細而又無措，一方面在無法言傳的意識之間將自己的焦慮感和無力感轉化為對一種不可知未來的嚮往，而另一方面通過強化潛在的“自主性”方式，凸出“出走”的僭越功能，從權力的關係中退出。經過這種心理變型，權力便不能成為個體自由生成的障礙。

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個體最重要的特質還不僅限於自我的自主性。蘇格拉底曾非常隱晦地道出了“個體”的真諦，即“從個體和理性的角度，而不是從城邦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行為和信仰，不應該無反思地遵從傳統所確立起來的社會規範和慣例”^⑪，這一想法的提出在當時完全被視為一種詭雅異俗。如今，很多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反而證明了蘇格拉底之語的預見性，《證詞》中的尼科爾便是其中之一。尼科爾自由、果敢並且叛逆，具有產生意義的無限可能性，但是其自我的生成依然需要在個體的實現層面得到辯護。她曾經這樣講述自己的人生規劃：“我想當個小動物獸醫，但是那個夢想對我來說似乎幼稚了點。後來，我又決定當一名外科醫生，但自打我在學校看了一段外科手術的錄影之後，就覺得很噁心”（*The Testaments* 49）。表面來看，尼科爾與現代社會所提倡的“‘個體’為本的價值觀”^⑫非常吻合，但是作為讀者的我們卻抑制不住好奇心去一探她的性格成因。具體來說，尼科爾更像小說中的一個越界者，她從小生活在加拿大，隨後被帶去基列，她的身世之謎一直到小說的後半部分才被揭開，儘管在此之前，讀者已經有了諸多猜測。從深層來看，身份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是個體的一種游離感，所以在她不明就裏跟著艾達來到了難民營之後，她會有這樣的感覺：“我和之前的自己不是同一個人，儘管我看上去沒什麼不一樣”（*The Testaments* 131）。當得知自己就是畫像中的尼科爾寶實時，她甚至對“個體確定性”^⑬產生了質疑：“我怎麼可能是那個人？我在腦海裏否認它，我尖叫著不。但是什麼都沒有改變”（*The Testaments* 185）。作者將尼科爾對自己的身世困惑與個體的存在結合起來。這樣，顯性的身世之謎與隱性的個體存在之謎便在文本中互相牽制，在兩者都無解的情況下，冥冥之中仿佛出現了另一種力量，將之引向自由的維度，這是促使尼科爾個體流變的一個重要轉折。然而，此處仍需討論的一個細節是：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尼科爾明顯區別於小說中的其他人物？答案還需要從她的生母奧芙弗雷德入手。作為一個基列國曾經的“奴役”，她的生活太過於沉重，不僅背負著當下的限制和壓力，還附著著曾經的歷史“積怨”。她期待有朝一日能夠擺脫約束，實現人生價值。因此，將尼科爾寄養在一個遠離基列耳目的地方，最大程度的讓尼科爾呼吸著自由的空氣長大，這是奧芙弗雷德對抗基列的方式，也是為什麼尼科爾給人一種與生俱來的使命感的原因，這些都間接促成了尼科爾個體人格的演變。

有評論家認為，《證詞》中尼科爾這個人物的出現不符合小說的設置，可細細讀來，才發現尼科爾承擔了小說中最重要的功能作用。如果沒有尼科爾，小說中個體的流變會不可避免的陷入絕境，她的出現不僅拯救了艾格尼絲，幫助她尋找有價值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在拯救艾格尼絲的同時，尼科爾也找到了自己的歸屬和人生目標。因此，小說中，艾格尼絲是尼科爾情節能夠成立的理由，而尼科爾又構成了艾格尼絲情節發生根

本變化的契機。站在藝術創作的層面來看,對於個體整全與自由、美好生活的理想主義建構則是阿特伍德統攝這兩個人物的共同理念。如此,我們方才明白,個體的強大和豐沛才是現代社會生命力的根本源泉。

三、建構社會共同體的抵禦力量

儘管“個體”在文本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解放,以“自由”的名義拒絕一切限制、干預和管控,但如果過於放縱,不免會在精神層面帶來心靈的孤獨,失去安全感,成為現代社會中典型的“陌生人”,長此以往,對於整個社會的發展也會釋放出消極的效應。因此,阿特伍德在小說中對“個體”流變的思考遠不止提供一個擺脫集體限制的機會,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呼喚人們建立起各種共同體,以另外一種積極的形式增強社會整體的凝聚力。而回到我們一開始對小說中民主的社會形式的論述層面來說,可以發現,早在《民主的圖景》(*Democratic Vistas*)中,惠特曼就指出民主理念的兩個方面:一則,民主制度是以“現代個人主義思想的力量”(the virtue of modern individualism)為旨意,它的基礎是每個人都“成為內向性和獨立的個體、身份和人格”;二則,民主制度同樣與個體之間的“團結”(solidarity)、“聯繫”(connectedness)與“親密感”(adhesiveness)^⑩密切相關。如此說來,以“個體權利”為主的個體主義在當下重新建立起新一輪的共同體變得十分緊要。滕尼斯認為在近代社會整體變遷的情況下,傳統的鄉村社會已經過渡到現代的商業社會,人際關係的特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共同體”連接的是具有共同利益的血緣、情感和倫理團結的紐帶。滕尼斯進而區分了“血緣共同體”(community by blood)、“地緣共同體”(community of place)和“精神共同體”(community of spirit)三種共同體。而對應於這三種共同體的具體人際關係就是“親屬”(kinship)、“鄰里”(neighbourhood)和“友誼”(friendship or comradeship)^⑪。《證詞》分別以“血緣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給予滕尼斯有效的回應。

不難看出,無論是“血緣共同體”還是“精神共同體”,《證詞》都強調表現在人物倫理、道德與責任心之上的柔性情感力量,她以“愛”之名來培育“個體”的德性,暗示親情、友愛是維繫彼此、共同生活的基礎,是生活在“如原始叢林般欲望橫流、放縱無序的混亂世界”^⑫的基列國人們隱秘渴望的。此種意義上來說,母愛首當其衝地承擔了重要的情感寄託,它代表家的呵護,讓個體最初的歸屬感得到保證。如英國小說家德拉布爾(Margaret Drabble, 1939-)曾言:“母親—孩子的關係是一種偉大的救贖,是無私的愛的反映”^⑬。小說中,母愛被視為一種最強烈最基本的本能,縈繞在文本的字裏行間。艾格尼絲最初的母親雖然不是她的親生母親,但是兩人之間細膩的母女情無處不在:“我的母親緊緊的抱著我。‘不管發生任何事情’她說,‘我希望你永遠記住我會一直愛你’”(The Testaments 23)。當尼科爾的真實身份被揭開之後,她曾一度質疑自己還是不是一個被母親牽掛的孩子,甚至於母親是否還記得她的存在,艾達告訴她,她的母親會經常通過各種途徑獲取她的照片,以便知道她是否安好:“做母親的總是會喜歡看到自己孩子的照片,她每次都是看完了之後就燒毀”(The Testaments 192),甚至於在小說最後的結尾,對母愛氛圍的烘托達到了高潮,姐妹兩的“出逃”不僅讓她們得以擺脫基列的管控,還如願和自己的母親重聚,當三人喜極而泣的相擁在一起時,母愛的聯結最終得以完成。需要明辨的是,小說中探討母愛的重點在於對不同個體的母愛情結的刻畫,它不是傳統意義上母親朝向孩子的維度,而是反過來由孩子走向母親的維度。也就是說,阿特伍德寫作的焦點不是母親如何愛護自己的孩子,而是身為孩子的艾格尼絲和尼科爾如何通過對母愛的追尋完成母女三人的聯結。

除此之外,友愛也是小說中醫治各類社會癥結重要而有效的方法。在《尼克馬科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中,亞裏士多德明確地指出倫理學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公正、幸福以及友愛,並且用“友愛”(philia)替換柏拉圖所言的“愛欲”(eros),突出了友愛是一種理性化情感,不與性欲、以及人的情緒相關。因此,納斯鮑姆(Martha Nussbaum, 1947-)評價亞裏士多德友愛的概念:“與其說它所強調的是那種充滿了強烈激情的渴望,倒不如說它所強調的是無私的幫助、共同的分享和相互的依存”^⑭。《證詞》表明,人要克服不合時宜地管

控,與世界、他人和諧共處的有效途徑便是友愛。艾格尼絲與貝卡處於相同年齡階段、相似的背景,二人之間的友情自然而又溫暖人心,她們有著共同的人生方向,常常分享各自的思想與疑惑。貝卡常常與艾格尼絲一起閱讀、學習,而每當艾格尼絲傷心、無助之時,她總是會想起貝卡,“我多希望她與我們一起”(The Testaments 356)。與此同時,隨著小說情節的發展,尼科爾養父母作為五月天特工的身份被揭發,他們其實是在秘密的保護尼科爾,這個曾經“被綁架”的孩子不被基列國發現,而在養父母雙雙因一場爆炸身亡之後,尼克爾跟隨艾達來到了難民營,遇見了以利亞和加思,這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他們共同的目的就是能夠摧毀基列。面對這種無階級感,並且能夠共用集體情勢的聯結,很容易讓我們想到霍爾(Stuart Hall)的“平民主義同一體”(populist unity),即“堅持某一特定路線下代表全民共同利益的普遍認同”^②。阿特伍德在建構這一共同體的過程中,給予每一位人物均等的出場機會與飽滿的熱情。大部分人物在自我個性得到確立的同時,都能夠意識到自己背負的責任,並勇於承擔。這樣的聯合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共同體自身所具有的穩固性和自由性雙重特徵。總體來看,《證詞》中的共同體在很大程度上既有自發性的,也有建構性的,它從一種理想的生活出發,意圖實現的是對人心的“救贖”,換言之,在尊重個性的基礎上,力主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理解與合作,這應該說比集體主義亦或是純粹的個體主義都更具備抵禦風險的能力。

結語

《證詞》創立之初便立意高遠地奔向了人類的生存問題,它引導我們去思考個體在社會環境變遷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又該何去何從?讓人頗感意外的地方可能在於阿特伍德在小說中對一種自由、公正、正義的社會形式的探尋,以及社會物質和文化財富合理分配的希冀。與此同時,阿特伍德將某一特定時期應運而生的社會轉型視為一個沒有任何參照物的實驗過程,惟其如此,我們才明白這個過程需要越來越多的人,不畏艱難的投入到這場實驗中才能延續下去,孜孜不輟。可能我們會有疑問,在基列大勢將去之後,眾人為之努力奮鬥的社會會是他們心中理想的樣子嗎?從《證詞》來看,這樣的理想屬於未來,充滿了開放性和隨時改變的勇氣。或許唯有這樣,才配得上阿特伍德創作“基列”這一系列作品時宏大而又自由馳騁的思維。

註釋

① Atwood, Margaret. (2019). *The testaments*. London: Penguin, 下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② 熟悉《使女》的讀者應該不難獲悉,《使女》是一部未來小說,且以美國馬薩諸塞州為背景。小說中虛構的時間起點便是2195年,而《證詞》則是在此時間起點上繼續往後順延15年。

③ Corrigan, Maureen. (2019). Atwood hints at a brighter future in “Handmaid” sequel *The testaments*. <https://www.npr.org/2019/09/09/759040269/atwood-hints-at-a-brighter-future-in-handmaid-sequel-the-testaments?t=1593766446104>.

④ Freeman, Laura. (2019). Book review: *The testaments* by Margaret Atwood. <https://www.bbc.com/culture/article/20190906-book-review-the-testaments-by-margaret-atwood>.

⑤ Freeman, Laura. (2019). Book review: *The testaments* by Margaret Atwood. <https://www.bbc.com/culture/article/20190906-book-review-the-testaments-by-margaret-atwood>.

⑥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著,秦明利譯:《生存:加拿大文學主題指南》,中國文聯出版公1991年版,頁10。

⑦ 袁霞:《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創作中的民族/國家思想之演進》,《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21年春,頁323。

⑧ “民主”(democracy),從詞源上來看,發源於古希臘語,基本含義為denm(人民)和kratos(權力或者統治),意即由人民來統治,這一點便使它區別於貴族制或君主制等其他政治形式。從雅典最初的民主政體到20世紀後期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民主”一直被人們不斷的探討、推進。如今,民主對我們來說已經不僅是一個概念或是一項制度,更重要的是一種生活

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民主促成了我們通往理想生活的實現途徑，並且成為當今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標準。

- ⑨ 李晶：《理想的民主與正義關係及其實現—艾利斯·揚的空間正義思想研究》，《山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8期，頁30。
- ⑩ Jimenez, Heffernan. (2013). Introduction: togetherness and its discontents. In P. M. Salvan et al. (Eds.), *Commu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London: Palgrave, P. 13.
- ⑪ Feldman, Lucy. (2020). Let's break down the most mysterious parts of *The testaments*,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argaret Atwood. <https://time.com/5673535/the-testaments-plot-questions-margaret-atwood/>.
- ⑫ 陳小慰：《一部反映現實的未來小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評析》，《當代外國文學》2003年第1期，頁165。
- ⑬ 亞裏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頁9。
- ⑭ 洛克著，葉啟芳、翟菊農譯：《政府論—論政府的真正起源、範圍和目的》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頁19。
- ⑮ 孫向晨：《論家：個體與親親》，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61頁。
- ⑯ 孫向晨：《論家：個體與親親》，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66頁。
- ⑰ 在笛卡爾看來，如果要找到一個確定可靠的起點，所採用的方法是普遍懷疑。他曾以蠟燭為例來討論這一問題：當我看著蠟燭時，有可能我所看見的實際上並不是蠟；也有可能是我連看東西的眼睛都沒有。笛卡爾主張以懷疑一切的方法充當人類知識達到確定性的一個有效途徑，從而找到人類知識的絕對起點。本文所使用的“個體確定性”在某種程度上借助了笛卡爾的這一哲思來隱喻主人公尼科爾在知道自己身世之後所產生的思想變化，以懷疑的方式達到最終的自我認同。
- ⑱ 文中關於惠特曼觀點的論述具體請參見 Whitman, Walt. (2002). *Democratic and vistas and other papers*.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Fredonia Books, P. 16, PP. 25—27, P. 38, P. 47.
- ⑲ 斐迪南·滕尼斯著，林榮遠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頁65-66。
- ⑳ 王一平：《應對“風險社會”的原教旨主義國家—論〈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國”對現代社會的顛覆》，《外國文學》2017年第2期，頁123。
- ㉑ Milton, Barbara. (1978). Margaret Drabble: the art of fiction LXX. *Paris Review*, Vol. 20 (fall-winter), P. 56.
- ㉒ 納斯鮑姆著，徐向東、陸萌譯：《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和哲學中的運氣和倫理》，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頁490。
- ㉓ Hall, Stuart. (1988).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P. 277.

(Editor: Nelson Sheng)